

# 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分析框架与典型案例\*

席伟健<sup>1</sup> 孙钰涵<sup>2</sup>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1.马克思主义学院; 2.二十一世纪中国研究中心, 广东 深圳 518055)

**[摘要]**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形成了基于中国文化、经济双重繁荣现象的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并将变革和扩展传统理论范式。从实践上看,当代中国人文经济为绿色发展提供了一种既不同于人工智能至上的“替代论”,也不同于自然环境至上的“田园论”,而是高度强调“人类现实交往”意义和“传统与现代结合”的可控方式,有利于实现可持续性。为深入揭示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过程,提出“继承传统—清晰界限—创新生态—扩大开放—价值推广”的“五层次四结合”分析框架,认为地方政府在赋能周期和发展周期可能存在成本收益“错位”问题,导致政策不可持续。结合深圳市大鹏新区以“打造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为战略目标的发展案例进行逐步检验。基于局部加权回归(Loess)、灰色关联度(GRA)和广义加性模型(GAM)等非参数方法诠释宏观赋能的积累性、滞后性和非线性作用,发现从投入人文经济建设到推动绿色发展存在5~6年的“错位”期。基于质性材料进一步阐明该案例在微观上将“传统岭南海疆人文精神”与“现代湾区滨海旅游经济”相结合赋能绿色发展的长期实践,通过培育生态旅游业逐步解决“错位”问题。总结人文经济建设对实现绿色发展与增强可持续性的理论贡献,以期为构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提供一种新思路。

**[关键词]**人文经济 绿色发展 可持续性 粤港澳大湾区 非参数方法

**[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983X(2026)02-0055-14

## 一、引言

自18世纪以来,全球北方依靠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先发优势,逐渐构筑了一整套以“自利”为假设、以“同情”为工具、以“看不见的手”为规制的经济社会体系,使资本主导的现代化模式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全面占据了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和生态环境等领域的高点。进入21世纪,代表资本利益的全球北方

国家集团内部屡次出现尖锐矛盾,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出现动荡变局,不仅悖逆其所倡导的人文精神和伦理意涵,更对自然环境造成了无从估量的重大损失。作为坚守“和平立场”、坚持“对话解决”和坚定“合作信心”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必将迎来构建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机遇。其中,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尤为重要,体现出中华民族对和谐、友善、普惠、包容和可持续

收稿日期:2025-04-28;修回日期:2025-06-09

\*基金项目:2025年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中国政治学标识性概念研究”(25BJ01002);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2025年度党史特别委托项目(GD25WTF04)

作者简介:席伟健,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副院长,中国政治学会理事,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孙钰涵,博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主要从事粤港澳大湾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

性等崇高人文价值的追求,能够为“增长动能不足”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不佳”的欠发达国家和“长期处于零增长”的“传统发达国家”实现和平增长、自主增长和二次增长提供有益借鉴。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不是孤立的观念游戏,而是一套完整的理论系统,根植于中国式现代化伟大成就,与中国既有的方针政策紧密相关。2023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苏杭都是在经济发展上走在前列的城市。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可以研究一下这里面的人文经济学。”<sup>[1]</sup>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苏州考察时指出:“苏州在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上做得很好,不仅有历史文化遗产,而且有高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sup>[2]</sup>这些重要论述为学界提供了丰富启示,使人们重新思考如何在实践中更好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互动、深入交往和相互理解,妥善应对人工智能至上的“替代论”、自然环境至上的“田园论”,达到“科技向善”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重的理想状态。作为一门具有原创性的“世界通用语言”<sup>[3]</sup>,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应关注并回答这一重大问题。

本文从分析框架、典型案例与政策建议角度依次展开,以对现象的探索性还原,尝试揭示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内在规律,并围绕“促进人类自主可控、可持续发展”的原则提供包容性政策建议,以期扩展和增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解释力、竞争力和影响力。

## 二、文献综述和分析框架

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一般消费市场中高质量精神文化产品和生态绿色产品供给相对不足的问题逐渐凸显,过去那种排浪式、以数量取胜的生产消费模式不再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以“美好生活”为目标的新

时代人文经济将助推一场以绿色发展为引领的“发展观革命”,给经济生产根本效用与功利目标以人文追问,使新时代人文经济逐步成为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主要范式。<sup>[4]</sup>比如,在乡村振兴事业中,要强调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方式激励群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工作,保障群众在改善生活环境、开发自然资源和制定环保政策等多方面的话语表达权利。<sup>[5]</sup>再比如,面对城市化考验,先行区管理者要将注意力时刻聚焦在发展全局的整体性上,通过提升文化生态等强公共品的供给水平来改善外来务工的生产生活环境。先行区管理者应通过政策设计引导他们在3~5年的经济积累后适时进入城市创新部门或城市创新产品对外推广机构,以基于亲缘、地缘和业缘等社会关系的反哺式人文经济传播绿色消费知识,从而优化“两大部类产品交换”的均衡性。<sup>[6]</sup>以此类推,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着力点在于破解和理顺中国基本城乡格局中的复杂性,本质上是社会科学空间转向和组织转向的思路体现。用人文经济的逻辑原则来规制现有科技应用环节的无序性,增进未来科技研发环节的人文性和生态可持续性,使科技成为密切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物质纽带。因此,若要实现这种正向循环,需充分发挥人文经济对传统人文知识网络的整合作用,促进多元性统一于可持续性实践之中,为美丽中国建设的全局性事业服务。

围绕这一问题,先前的研究已经从不同侧面完成了一些探索,但是对人文经济发挥正外部性的赋能过程探讨不足。有学者从哲学角度强调,无论是生产力创新还是生态改善,都“无法脱离文化而存在,背后都有文化作为坚实支撑”;如果希望达到“文明”高度就必须以人的文明作为价值旨归,应“通过激发和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人文经济逻辑”,实现“以文兴业、以文赋能、以文育人”的目的。<sup>[7]</sup>罗卫东认为,“以人为本的人文经济,必须要探索建立自然友好型新经济体系。绿色必然是人文经济的底色,人文经济必然是绿色经济”。<sup>[8]</sup>

田红娜等从科技向善的实证主义伦理学角度切入研究数字化与绿色创新的关系,发现其中容易混入“以善为名的寻租借口”<sup>[9]</sup>,当寻租水平较高时数字化反而会制约绿色创新,说明技术进步并不必然带来环境改善,构建人文经济有其重要意义。桑明旭和徐星美则提出应“高度警惕西方人文经济学的主观主义理论逻辑和自由主义价值立场”<sup>[10]</sup>,片面诉诸伦理和教化方式只会陷入对人和人性本质的抽象苦思,造成观点立场脱离社会现实。从笔者在意大利大学课堂的实地观察看,即便是来自意大利本地、欧洲其他国家、中东和北非(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简称MENA)的年轻人也已经普遍丧失对这种纯粹说教行为的兴趣。但更为尴尬的是,他们对主观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抗争是采用更加自由主义的“反叛”方式,不得不引发教授对发展前景的深思和担忧,期待中国在这场变革中发挥更具主动性和建设性的作用。董慧以中外现代化改革实践的比较为例,指出人文经济不应陷入经济增长的“人文悖论”<sup>[11]</sup>,既要超越片面强调物质利益和理性经济规则的“经济人假设”,又要超越具有泛娱乐化倾向和盲目追寻精神世界的“文化人假设”,注重人文经济学的民族历史性、人文经济价值的普遍关照性、人文经济与改革实践的耦合互促性。

根据上述文献,人文经济在以和合为理念的新时代语境下逐步由一个个独立的元素融为一个整体,并将在象征主体化的概念升维中完成对经济增长底层逻辑的重构,而绿色发展可以为新时代人文经济完成这一目标实现从“有限工具”到“有力工具”的治理能力转变,呼应有为政府、有效市场的知识系统开发。根据文献综述和笔者在粤港澳大湾区的田野调查,初步发现人文经济在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不同环节都与绿色发展的概念紧密结合,体现出一种有机结合的链式过程。考虑到“央-地”政绩要求的现实性,借鉴生态导向发展(Ecology-Oriented Development,简称EOD)的经济原则<sup>[12]</sup>,促进区域开放政策的转变必须立足发展大局辩证考虑

改革成本和收益之间的内在关系,以发展收益的普惠性和公共性补偿赋能成本。此外,面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复杂性,单一维度难以充分揭示改革发展中许多“小切口”,不能有效解决区域可持续发展“大问题”。所以需要强调视角结合、工具结合、价值结合,使分析框架和所得结论更具稳健性。

目前,学界对于“赋能”的语用定义至少有三类,从影响程度上可以由浅入深被划分为:改变主体功能<sup>[13-14]</sup>(比如能力分析、类型学分析);改变作用方式<sup>[15-16]</sup>(比如政策与政策之间、技术与政策之间的协同性);改变概念内涵<sup>[17]</sup>(比如新技术对传统学术概念的重塑)。可见,严谨的“赋能”关系要求在理论上对事物的全生命周期改善均有所考量,在实践上应对政府宏观设计有所启发,帮助扩展和强化地方政府的“概念工具包”,支持基层治理能力建设。

本文从层次性的过程视角诠释这一原则,认为赋能关系是指一种发展模式在运行中对另一种发展模式的激活和驱动,从而在一定时期内共同促进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总目标的历史性过程,为全面深化人文经济意涵、拓展绿色发展的可行性提供新思路(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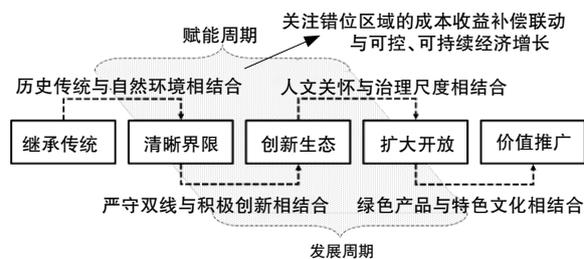


图1 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五层次四结合”分析框架

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五层次四结合”分析框架可以分为两部分来理解,包括一方面从初阶继承传统到高阶的链式过程分析,另一方面从赋能周期到发展周期时空背景的错位区域分析。其中,处于较高阶段的价值推广是指将区域可持续发展中的优势经验和物质产品转化为易于传播、接受的生态文化和绿色生活方式,体现出一个地区从人文、经济到生态环境领域均具有较强的软实力。

从链式过程角度看,继承传统应作为人文经济自身运作成形的首要条件,因为凡是历史文化繁荣的地方必然要有一定物质和精神载体支撑<sup>[18]</sup>。以意大利为例,第一,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离不开众多宏伟建筑和艺术作品的留存。罗马斗兽场是古罗马帝国辉煌的象征,佛罗伦萨的大教堂则蕴含着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精髓。这些物质载体不仅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更是意大利文化传承与旅游经济蓬勃发展的基石。因此,人文经济的形成必须首先强调继承传统,在不制约居民日常生活的前提下,创造性地保留原始风貌。第二,随着人文资源市场化进程逐步推进,自然环境必然因人类活动频繁而面临更大承载压力,这就要求地方政府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明晰“双线”,即生态保护红线和环境质量底线,并使其与历史传统相结合,更好发挥政府部门对人文产品设计引导的职能。第三,根据奖罚并举的原则,辩证理解一定区域内法治约束与创新激励之间的平衡点尤为重要,分析如何使严守双线与积极创新相结合,考虑一种“促进型规制”<sup>[19]</sup>的可行性和适用性。第四,立足中外人文普遍交往、现实交往的必然趋势,分析环境治理面向繁荣人文经济要求时“台前”和“幕后”的张力,发挥数据要素促进有序、和谐与精准执法的重要人文关怀价值,建设数字生态文明。第五,在微观产品供给上注重绿色天然性和在地文化性,打通“物质-精神-记忆”特色文化产品的内在联系,增强属地纪念品的文化获得感,助力人文经济模式的价值推广与可持续发展。

从时空背景角度看,“赋能”效应显化具有一定的积累性、滞后性和非线性,需要由政府主动引导绿色发展的进程和节奏,自下而上对齐政策目标,发扬历史主动、掌握战略主动。从“公平-效率”平衡原则出发,地方政府应自始至终通盘考虑“成本-收益”在质量、数量、转化速度、转化频率(连续性或离散性)以及人文公共资产安全性、稳定性、普惠性和发展潜能等方面综合表现,保证发展政策的可持续性。

在赋能周期,地方政府的成本投入可能会更多着眼于地方主体性构建<sup>[20]</sup>,强调本土人才在实践中学习成长的机会配置优势,同时使用全球化招投标的方式购买外部知识和品牌传播渠道。在发展周期,创新生态建设更多依靠“硬”科技进行“中央突破”,实现快速市场扩张、制造业规模化和就业需求消纳。其中,一方面应对国际市场压力时要更加注重研发投入、增强技术积淀,避免困扰于“非市场因素”导致国际市场占有率不及预期,从而打乱企业既有方略;另一方面要善做支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的耐心资本,厚植现代中国、21世纪中国软实力,探索“自然+人文+创新+绿色”的可持续赋能系统,识别人文环境对经济收益的贡献度。在赋能周期和发展周期的错位区域,地方政府和企业会为新模式付出一定的学习成本和试错成本;互助合作的人文精神能够支持信任机制的韧性;人文经济赋予绿色发展以创新空间和在一定技术积累之上“换道超车”的可能性,启发思考“长期资本、耐心资本和大胆资本”因何而出与何以可为的深层人文经济逻辑。

总之,关于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探索是对整合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知识网络的有益尝试,需要更多“以小见大”的详细材料予以检验和再构。下文将围绕“打造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的战略目标,紧密结合分析框架对粤港澳大湾区内的深圳市大鹏新区发展案例进行具体分析。

### 三、典型案例

#### (一) 深圳市大鹏新区的宏观赋能过程分析

前文提出的“五层次四结合”分析框架包含一个总体逻辑,即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宏观赋能可能存在一种来自赋能周期和发展周期之间的错位区域,为证明其现实存在性,需要引入具体数据进行分析。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强调“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具有经济水平较高的特殊要求。所以需要

通过对“先行区”数据变化细节的深度挖掘来说明并认识“错位”问题存在的可能,下面引入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区级案例——深圳市大鹏新区作为实证对象。

大鹏新区是于2011年12月在原深圳市龙岗区葵涌街道、大鹏街道和南澳街道基础上成立的功能新区,在宏观规划中被定位为海洋生态文明先行示范区,在经济转型目标中被定义为“打造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由于半岛型地理环境“三面临海、一面连陆”的天然半封闭性,大鹏新区必须在确保履行生态环境保护首要责任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既符合环境保护要求又增进民生福祉的发展新路,以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便成为该区近十余年选择的一条逻辑主线。相比于毗邻大鹏新区的H市Y区同时发展房地产、石化工业和旅游业(私有性、污染带来的负外部性与全域旅游的公益性相互矛盾),大鹏新区所选择的以滨海生态旅游事业为主体道路不可能立竿见影,而是需要地方政府敢于在看不到经济收益的前提下作出决断,制定计划、长期投入、深度耕耘,使制度稳定性、连续性和执行力逐步转化为优越性,突破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错位区域。从传统西方经济学和中国古代经济运行实践的视角看,这种做法无异于徒增沉没成本,既不符合

商业逻辑,也不符合统治逻辑。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向来强调长期主义、整体主义与和谐导向,不仅将百姓生计作为维护社会稳定安全的需要,更将公共服务建设作为提振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使普惠、高效、绿色的技术与服务新供给创造并满足新需求,最终实现的是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从学理上,以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中国式现代化经验既要超越《管子·侈靡》篇中提到“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sup>[21](P310)</sup>所表达的封建帝国式经济观点,又要超越西方“马尔萨斯(地主阶级奢侈消费促进经济)-李嘉图(资产阶级自由贸易促进经济)辩论”(Malthus-Ricardo Debate)的思维局限<sup>[22]</sup>。

为更加直观审视错位区域在成本收益关系上的生成、扩张与逆转特征,引入衡量大鹏新区主导经济面向旅游业转型的总体指标:历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总和(表征政府投入)、历年总接待游客人数(表征人文经济),分别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由于大鹏新区成立前的数据无法取得,所以将时间范围设定为2013年至2023年共11个取值点(见表1),年度数据不区分旅游业淡旺季差异,生成时序数据拟合结果

表1 大鹏新区2013—2023年旅游接待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数据

年份	总接待游客人数(万人次)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亿元)
2013	862.67	22.8168
2014	977.71	24.2118
2015	1000.07	29.242
2016	1039.36	69.579
2017	1079.92	59.7981
2018	886.95	68.1614
2019	1063.45	64.8897
2020	967.91	65.3508
2021	1394.88	69.2312
2022	1407.53	88.6729
2023	1611.74	64.19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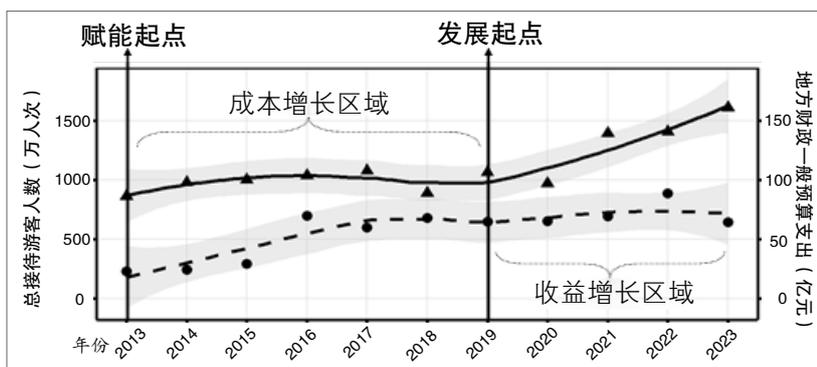


图2 深圳市大鹏新区2013年至2023年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类·型”错位过程

数据来源:深圳市大鹏新区2022年统计年鉴及2023年统计公报。

注:实线三角形为大鹏新区年总接待游客人数(旅游业收入与其呈强正相关,且近年增速较快),主要来源为广东省内游客,所以受疫情防控政策影响较小。虚线圆形为大鹏新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其中约20%来源于本地财政收入,约70%来源于深圳市各类转移性收入,用途主要为民生“七有”工作等公共服务,包括“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众扶”,直接投入深圳市大鹏新区人文环境建设。一般而言,地方对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服务建设的经费支出经常需要跨年度或延后支付,所以既要避免数据局部波动的干扰,也要避免数据特征丢失。本文对两组数据均采用基于局部加权回归(Loess)的非参数方法进行平滑拟合,置信区间为95%,权重函数为三次立方权重函数(tricube weight function),常数c默认取值0.2,参数span取值0.75,degree取值2。参见:CLEVELAND W S. Robust lo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and smoothing scatterplot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1979, 74(368), 829-836.

(见图2)。

本文进一步使用Bootstrap法对原始数据进行1000次有放回的抽样,以检验模型稳健性。结果显示:对于总接待游客人数,原始模型的 $R^2$ 为0.9008,表明模型能够解释约90.08%的数据变异,拟合效果较好。通过Bootstrap方法抽样后, $R^2$ 值95%置信区间下限为0.8027,上限为1.0000,说明即使在不同的抽样情况下,模型依然能保持较高的解释力,进一步验证了原始模型的稳健性。对于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原始模型 $R^2$ 为0.8321,表明模型能够解释约83.21%的数据变异,拟合效果较为理想。经过Bootstrap抽样后 $R^2$ 值95%置信区间下限为0.7862,上限为1.0000,说明模型在不同样本下的表现较为稳定,原始模型的拟合结果具有较高的可靠性。总体而言,无论是总接待游客人数还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模型的拟合效果都较为稳健,能够较好地反映两者的时间趋势变化。

根据因果推断的基本原则分析图2所示的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类 $\infty$ 型”错位过程(“ $\infty$ ”为数学中的无穷符号,读作Infinity),有以下4点可以说明大鹏新区历年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有较大可能对其总接待游客人数产生前文所提到的“积累性”效应,并且引申出“滞后性”猜想。

第一,从因果关系的时序性角度分析关系成立。即,原因发生在结果之前:基于转移性收入的预算支出扩张发生在大鹏新区成立之初的2011年至2017年,此后保持稳定水平,而省内游客人数从2019年开始稳步增长,没有明显受到外部事件冲击影响,且两者在发生时点上的先后顺序也说明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的可能性。

第二,从因果关系的关联强度角度分析关系成立。由图2直观可见2013年至2018年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2019年至2023年的年总接待游客人数在斜率上存在较强相似性,可以进一步通过其他方法对此进行检验。

第三,从因果关系的特征性和一致性角度分析关系成立。大鹏新区以“打造世界级滨海

生态旅游度假区”作为战略目标,且从地理上为“山海”地形,少有平原。现今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在明代统称“新安县”,于明万历年即公元1573年由东莞县析出。根据清朝县志记载,“新安地方,西北皆山,东南皆海,小民无田可耕,耕者多属下则瘠壤,止种薯、芋、蔬、菽为食,中、上则之田无几(资料编号:XA20230411a)”。此外,采珍珠和制盐曾是古代这一地区的支柱产业。早在唐代,新安海域(时称南海郡)就高产珍珠。经南汉特设的“媚川都”采珠军队、元朝特设“采金银珠子都提举司”先后两次大规模采珠,新安海域的珍珠生态被完全破坏,对该地区自然环境造成不可逆伤害,至今这一地区都鲜见天然珍珠的生产。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历史因素、自然因素还是现实政策因素,大鹏新区都不具备大力发展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条件,说明假定因果关系与已知的大鹏新区人文历史和多数经济学常识保持一致。

第四,从控制变量的角度分析因果关系成立。在以游客人数为因变量的研究中,除人文环境与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外,还经常将交通方式<sup>[23]</sup>或景点营销<sup>[24]</sup>纳入核心影响因素。但是从笔者实地调查和资料搜集看,半岛型地貌导致通往大鹏新区主要旅游目的地仅有一条隧道,且深圳市对大鹏新区长期实行交通管制措施,“自驾(9座及以下小型客车)前往大鹏新区需预约。未预约、备案的小型客车进入交通管制区域、道路的,将按照违反禁行、限行规定,处300元罚款,扣1分(资料编号:SD20250226)”。所以,交通方式并不构成游客人数增长的重要原因。在景点营销方面,自2012年以来收费旅游景点接纳游客人数与非收费旅游景点接纳游客人数的比例长期稳定在5:14左右,以非收费旅游景点为主,且大鹏新区为知名的“深圳市后花园”,旅游方式以日常假日休闲为主。因此,景点营销对本研究关注区间影响有限。

为进一步验证“滞后性”猜想,我们引

入旅游研究常用的灰色关联度分析法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简称GRA) 并对自变量预算支出进行多期滞后、因变量游客人数不滞后的算法改造。结果显示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在滞后3期、滞后4期和滞后6期时对总接待游客人数的关联度较强 (见表2)。

为进一步捕捉这种“滞后性”所隐藏的“非线性”赋能作用机制, 我们继续引入机器学习

领域中的广义加性模型 (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s, 简称GAM) 进行分析, 观察当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滞后时, 不同滞后期分别对总接待游客人数的潜在影响。由于平滑项自由度 (K值) 对数据量存在一定要求, 无法计算滞后8期和9期, 结合表2所提示的关联性强弱变化趋势, 将滞后期设置为1期至7期、平滑项自由度上限设置为3。基函数设置为三次样条, 确保拟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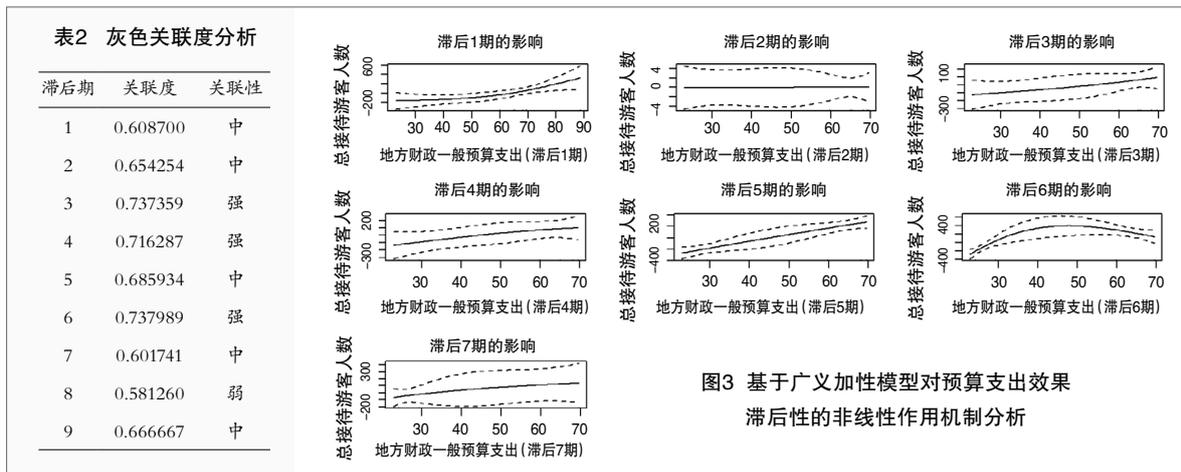


图3 基于广义加性模型对预算支出效果滞后性的非线性作用机制分析

滞后期数	实际自由度	F	P	调整R <sup>2</sup>	偏差解释	REML	n	结果
1	1.406	3.843	0.033	0.461	54.50%	62.145	10	显著但欠拟合
2	0.000	0.000	0.386	0.000	0.01%	56.523	9	不显著
3	0.732	1.008	0.143	0.224	30.50%	49.462	8	不显著
4	0.748	1.074	0.148	0.264	35.50%	42.753	7	不显著
5	1.188	15.290	0.006	0.859	89.30%	33.173	6	显著
6	1.790	12.230	0.068	0.859	92.20%	27.832	5	显著
7	0.564	0.532	0.323	0.262	40.10%	21.674	4	不显著

优度和可解释性。结果如图3和表3所示。

本文进一步将基函数修改为立方回归样条和薄板回归样条进行重复实验, 保持自由度不变, 具体结果如图4所示。首先, 结果发现图

形趋势相似, 说明结果对基函数选择不敏感, 模型较为稳健。其次, 三次样条在捕捉非线性关系方面表现更为突出, 立方回归样条和薄板回归样条的置信区间相对更为稳定和对称。最后, 三种基函数虽然在曲线形状和置信区间上有所不同, 但整体趋势大致相似。这表明, 无论选择哪种基函数, 大鹏新区的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与游客接待人数之间都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 说明模型具有较高的信度。

综合局部加权回归法、灰色关联度分析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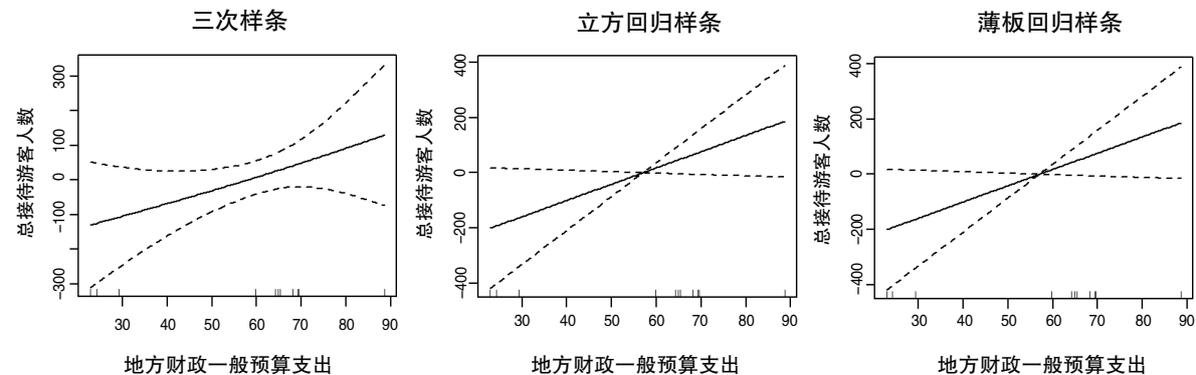


图4 不同样条下广义加性模型的拟合情况

和广义加性模型的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大鹏新区财政投入对其主导产业旅游业的发展效应会在5至6年后才会逐步显著,特别是在滞后6年时产生一个周期性的“峰值”。这说明政府投入的必要性和政府与企业投入的平衡性意义,启示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是一个长期的综合性投入过程,需要政府引领各方力量协同参与。考虑到新冠疫情的外生冲击逐步消退与特朗普政府主导的全球贸易战、关税战衍生的人文环境恶化现象逐步加剧,未来旅游业发展仍存在不确定性。但是中国作为全球负责任大国必然会持续贡献稳定力量,这就需要地方政府将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更多地投入到人文环境和人文经济建设之中,坚定不移走绿色发展之路,保持宏观政策可持续性。在人文经济的宏观赋能之下,一方面需要从游客与目的地分析中进一步挖掘特征,找出共性规律,另一方面也需要深入考察地方政府财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究竟用在了哪些地方?如何对旅游业建设和环境可持续性做出贡献?下面进一步围绕“五层次四结合”分析框架中的结合过程对深圳市大鹏新区的微观赋能实践展开分析。

## (二) 深圳市大鹏新区的微观赋能实践分析

### 1. 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相结合

大鹏新区将“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的做法是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认识论基础,特别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德治、善治和法治强调的承继较早可追溯至清朝时期。

自古以来,每个区域的自然生态环境都立足在“四至八到”<sup>①</sup>的地理框架基础上。深圳市和香港特别行政区虽地处中国大陆边疆,但无论是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政治意义,还是经济意义、社会意义出发,都处于重要地理方位。从资料上看,深圳市地方史志的奠基者、

清朝时任知县的舒懋官主修的嘉庆版《新安县志》是深圳市古代地方志的最终版。舒懋官在1819年修志的首要目的是厘清县治沿革与源流,以及解决四至八到的勘定问题。在这一时期,深圳市的地理框架与海疆问题、殖民问题以及疍家<sup>②</sup>问题等社会治理问题息息相关。舒懋官强调新安地区的海疆范围不能单纯沿用一般的海疆统计方法,因为“新安海外岛屿甚多,其下皆有村落,固不能不合计海面,而遗居民于幅员之外也。且以四至定县治,不能以县治定四至,故须统计海洋,开方画界……海面则以极尽处之山为止(资料编号:XA20230411b)”。这一论述阐明两点问题:一方面,新安地区不仅包括大陆,而且涵盖诸多岛屿及其领海。新安以南的山、岛,都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也是大鹏半岛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地区治理与经济建设必然要以人民为中心。无论是岛民、还是疍家,皆为同胞,有权利获得社会保障、追求美好生活,这在古代就曾屡次被纳入决策议程,如“编疍甲以塞盗源、恩恤广东疍户”。用四至决定治理范围的论述则充分阐明人文经济与自然环境的紧密关系,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自然环境框架内完成社会治理与人文经济建设。在这种历史传统基础上,改革开放后的深圳市进一步结合现代国土空间测量技术清晰环境边界,通过繁荣人文经济的方式逐步推动绿色发展。

由于地处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深圳市龙岗区早在20世纪90年代就受到国内外关注,也由此较早地开展环境保护工作,为长期稳固环境质量底线和生态保护红线打下坚实基础。1993年,龙岗区环境保护局与中国环境科学院、华南环境科学研究所等机构合作测定区内流域、海域、大气环境容量,深入调查区内主

<sup>①</sup>“四至”是指“东、西、南、北”,“八到”是指在“四至”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加“东南、西南、东北、西北”。“四至八到”泛指周围地界,是中国古代标明地理方位的专用术语,至今在中国基层的许多乡村事务中仍有一定影响。

<sup>②</sup>疍家又称为蛋家、蜑家,是对福建、广东、广西等沿海地区海上渔民的统称。在一种长期的、特殊的“海上游牧”中,蛋家人历代以打渔为生计来源,以渔船为居所。这些人的来源复杂,被古代官僚勒令不准上岸、不准与岸上的人民通婚,受到歧视,滋生许多不平等的事端。新中国成立后,蛋家人获得了真正的解放,不再受到歧视。随着时间推移,蛋家人逐渐上岸居住,并与岸上居民接触、通婚,现在已经在各沿海地区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疍家渔村和疍家小镇。

要污染源，在1995年编制完成全区第一部《环境总体规划》以及《环境保护“九五”计划和二〇一〇年长远计划》。随附规划和计划的工具还有《规划手册》以及《计算机管理系统使用说明》。这说明环境保护部门对规划和计划的落实具有一定准备。从内容上看，这些规划和计划的可行性较强，体现在当时规划就已经能够“既考虑深圳市总体规划中龙岗区分为4个组团的功能要求，又体现10个镇的各自特点，分区域制定水、气污染总量控制实施等一系列方案（资料编号：GH20231017）”。这种规划的精细化程度在当时全国区、镇一级单位是鲜见的。所谓“组团”是深圳市早期城市规划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分为“带状组团结构”和“网状组团结构”，前者最早构思于1982年的深圳市《总体规划图》。在规划中，组团和山体、水系、植被等一起被归纳为用地规划的依据。龙岗区“4个组团”就是沿着深圳市东部发展轴开发的龙岗中心组团、坪地组团、坑梓组团和东部工业组团。这4个组团的位置均分布在龙岗区北部，是早期龙岗区推动工业化的核心区域。除规划本体外，规划编制工作还在客观上汇集大量的基础资料、规划方法和法规文件。在此之后，《“十五”规划》《生态保护和建设规划》《生态示范区建设规划》接连推出，龙岗区严格的生态保护工作成为一套行之有效的体系。除龙岗建区之初就提出的“山海龙岗、生态龙岗”的理念以及全区范围的封山育林政策，大鹏半岛还被视为龙岗区的水源命脉，从而被要求单独在这一地区建设3.47亿平方米生态公益林。以此，保护水土、涵养水源，使全区水库水质得到保障。

综上所述，深圳市龙岗区及后来划分出来的大鹏新区对“历史传统与自然环境相结合”理念的实践体现出较强的前瞻性、预留性和科学性等特点。这些实践在其产生之时并没有立刻发挥全部效能，而是作为规范被地方政府代际接续传承。在行为视角下，由于高度严格的环境保护传统，绿色发展成为大鹏新区寻求创新的首要选择。

## 2. 严守双线与积极创新相结合

大鹏新区将“严守双线与积极创新相结合”的做法主要体现在坚持环境保护与推动全域旅游创新建设的平衡，将“传统岭南海疆人文精神”与“现代湾区滨海旅游经济”相结合的实践向度与“打造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的战略目标相统一。

在严守双线与积极创新之间存在一种潜在矛盾，需要由地方政府因地制宜综合施策，一方面，严守环境质量底线和生态保护红线能够确保大鹏新区的环境承载力不因旅游业发展而逾越阈值上限；另一方面，区位优势又为大鹏新区对外开放提供先天条件，形成以跨境自由旅行消费引导投资创新的新发展方式，并助力实现世界级战略目标。为解决好这一矛盾，深圳市大鹏新区以增进域内外人文交流为核心理念采取多种创新举措。在制度建设方面，大鹏新区主动选择向深圳市内其他先进地区汲取经验。比如与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简称“前海合作区”）保持密切交流，从而在制定《深圳市国际船舶条例》的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转化形成适应大鹏新区本地的国际船舶管理制度。通过积极争取和协调，广东全省首个环境资源民事、刑事和行政案件“三合一”专业审判法庭落户大鹏新区，深圳市首家环境法治实践研究基地落户大鹏新区，成立“鲸落”海洋清洁联盟，使大鹏新区在生态环境保护与法治领域的地位得到巩固与增强。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大鹏新区与高德地图合作，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和线路，境内游客可以通过高德地图查询大鹏新区内各个景点的实时游客数量、最佳游览路线等信息，境外游客可以通过高德地图接受多语言的导航服务，以及跨境旅游咨询、预订、导航等一站式服务；利用其大数据和精准导航优势，为游客提供个性化的旅游推荐和实时交通信息，帮助游客更好地规划行程，提升旅游体验；引入智能公交调度系统，通过实时监测公交车辆的运行状态，优化调度方案、提高公交运营效率。此外，高德地图还为大

鹏新区的停车场提供了智能引导服务,帮助游客快速找到空闲停车位。

最为重要的是,大鹏新区在作为立区之本的旅游产业设计上创新提出“四全开放”的战略布局,即全域、全时、全龄和全业开放。

第一,全域开放。全域旅游即在大鹏新区范围内处处是旅游目的地,游客没有刻意奔赴某个旅游景点的必要,就可以自然自在地体会大鹏之美和大鹏生活之美。大鹏新区规划打造“三湾一区十集群”遍布半岛的各个角落。游客若身处大鹏半岛中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去往区内的相对最远地区所花费的时间不超过1小时。在全域概念的空间开放中,原本被各旅游目的地之间的交通距离所分割的一部分时间也被重新整合,形成整体的休闲时间、享受时间,除工作时间之外的人将逐渐完全回归到自然生态环境之中,获得生态中的人类本应享有的生态生活方式。

第二,全时开放。为丰富文化旅游内容、拓展体验活动在时间尺度上的分布范围,除常规开展的户外运动、特色美食、文化艺术等人工活动,大鹏新区还充分结合本地生物多样性强的优势,以“夜经济”为特色主体,吸引游客驻地体验。在大鹏新区西涌社区,游客不但可以在气象条件良好的情况下观赏浩瀚繁星,还能够能够在林、草之间观赏萤火虫,体会当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宁静之美。

第三,全龄开放。《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提出“完善滨海旅游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体系”,围绕这一要求,大鹏新区提出全年龄段开放布局策略,推动域内文旅基础设施满足老龄康养与幼龄亲子的需求,比如在大鹏新区新大社区建设以乐高国际乐园为代表的大型亲子游乐场(2~12岁);在生态康养方面,大鹏新区以“差异化”为策略,提前布局“医养结合,以养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引入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队伍和技术,成立大鹏新区医疗健康集团,提高康养服务供给质量。

第四,全业开放。旅游业所带来的客流是

大鹏新区内各行业消费需求的主要来源,因此大鹏新区提出全业态开放,既要求各行业支持旅游,也要求旅游业回馈所有行业,使生态生活和绿色生产相联结。在全业态开放方面,大鹏新区主要有三项具体做法:第一,大鹏新区在近年来积极推动特色文化街区建设,融入当地特色美食体验。第二,推动建设坝光文体中心和葵涌生态体育公园,使体育产业与旅游事业相结合。第三,根据区位优势,建设南澳口岸码头作为海上交通基础设施枢纽,复现该地区在历史上的人文经济繁荣景象。在历史上,南澳地区曾设立过海关机构。清代称之为“关厂”,民国时期称之为“分卡”,抗日战争时期又改称为“支关”。1961年,海关改设为“南澳监管组”。1964年海关业务改由位于葵涌的沙鱼涌工作组负责。时至今日,在南澳地区仍保留有“关厂小区”“关厂路”的地名以及相关历史文化遗产。依托南澳口岸码头所推动的国际游艇旅游自由港政策,通过综合改革授权实现海事、海关监管政策突破以及实行游艇登记与证书互认的政策,使国际游艇能够在游艇口岸直接停泊并以简化程序办理入境手续,开展各类跨境旅游活动,推动大鹏新区承载的近代历史文化和生态旅游紧密结合,让游客直观感受近代中国治乱兴衰的伟大变革成就。

### 3.人文关怀与治理尺度相结合

大鹏新区将“人文关怀与治理尺度相结合”的做法主要体现为:在秉持开放包容理念的旅游业建设基础之上,一方面广泛吸纳深圳市和大鹏新区本土力量融入生态治理体系,另一方面积极遵循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对粤港澳大湾区的要求,与国际规则和国际知识网络相衔接,增进国内外两方面人文交流理解。

在内部生态治理体系中,大鹏新区将人文关怀与对环境关心相统一,坚持落实“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政策。2019年以来,大鹏新区在流域治理的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建成污水管网300公里,使污水收集处理率提升到98.5%,接近实现创建污水零直

排区的重要目标。大鹏新区相比深圳市其他区提前两年半完成黑臭水体治理任务，完成雨污分流改造房屋1.2万栋，建成县域节水型社会。在陆域治理层面，大鹏新区通过植树造林88亩，抚育森林1.65万亩，强化森林生态修复，加快具有地域特色的红树林湿地公园建设，不仅为游客提供了观赏红树林和候鸟的绝佳场所，还成为了科研和教育的重要基地，吸引了众多科研机构和学校前来开展生态研究和环境教育活动。大鹏新区在深圳市率先创建古树坐标“一张图”管理，坝光古树群入选广东十大最美古树群，使“四季常青”的美丽大鹏成为游客和居民的集体记忆。在海域治理层面，大鹏新区积极借助全国珊瑚日、全国净滩公益活动的契机，养护人工礁盘28座、珊瑚1万余株，为多种海洋生物提供保护，增强海洋生物多样性，降低海浪对陆岸的冲击力。通过在海域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大鹏新区不仅为珊瑚礁生态养护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平台，还为海洋生态资源的人工修复积累了宝贵的经验，通过增殖放流举措，大鹏新区海域鱼类、甲壳类、头足类、贝类等游泳生物超过190种，藻类等浮游植物超过130种，蜂巢珊瑚、角蜂巢珊瑚、陀螺珊瑚、滨珊瑚等珊瑚超过60种，重点珊瑚分布区活珊瑚覆盖率达到50%，大鹏新区海洋生态环境逐步恢复与清朝《县志》中所描绘相一致的繁荣景象。

在对外环境治理合作中，大鹏新区积极响应国际上、特别是欧洲地区倡导的应对气候变化理念，推动减污降碳一体化工作，同时为中国碳汇核算方法的前沿探索做出贡献。结合本地区海洋资源丰富的优势，大鹏新区积极探索海洋碳汇（Ocean Carbon Sink，又称“蓝碳”）的深层潜力。2022年9月26日，自然资源部正式发布《海洋碳汇核算方法》行业标准，文件提出“海洋碳汇是指红树林、盐沼、海草床等从空气或海水中吸收并储存大气中二氧化碳的过程、活动和机制。”根据这一定义，文件规范了所列举的六类事物的碳汇能力计算方式。在自

然资源部出台正式的行业标准之前，深圳市大鹏新区就已经在2021年6月发布了全国首部《海洋碳汇核算指南》作为深圳市地方标准。2022年9月至10月，深圳市生态环境局面向社会公开征求关于指南内容修订的意见。

作为一种重要创新，大鹏新区探索将人文精神融入绿色金融设计中，比如在海洋碳汇的知识系统中，将概念从物种和物体本身扩展到海洋生态系统生物自然生长和人为干预过程，创新“活动碳汇”的概念，突出强调人与自然的互动。这种探索表明，人类并不必然是碳的排放者、自然生态环境的消耗者，也可以是自然生态环境的改善者、碳的吸收者。大鹏新区进一步梳理和完善海洋碳汇核算的工作流程，明确核算周期与边界，使海洋碳汇核算的时空范畴得到明确规定。在最为重要的“总碳汇量”核算方面，大鹏新区结合本地实际情况，提出浮游植物和底栖植物、鱼类、贝类、红树林、盐沼植物、沉积物等碳汇种类。深圳市大鹏新区《海洋碳汇核算指南》具体相对于国家方法的改善之处主要有四点：一是在红树乔木林的核算中，根据是否可获得蓄积量数据分别核算；二是在贝类和鱼类饵料的核算中剔除人工饵料所含的碳；三是根据干湿质量转换率和含碳率计算鱼类碳汇；四是考虑养殖、复种、管养等人工干预活动中产生的活动碳汇。这些核算标准设计对未来通用标准设计和中国标准的全球话语权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 4. 绿色产品与特色文化相结合

大鹏新区将“绿色产品与特色文化相结合”的做法主要体现深入挖掘本地历史和特色文化传统，塑造自然生态化的绿色文化产品和绿色科普产品。

在绿色文化产品生产方面，大鹏新区一方面积极推动人文历史元素融入生态旅游业发展，活化传统村落和以大鹏追念英烈习俗（大鹏清醮）为代表的非遗项目；另一方面推动濠粉仔、打米饼、客家茶果制作技艺、绿丸仔制作技艺、海胆粽制作技艺等非遗美食推陈出新，增

强大鹏新区人文精神从视觉到味觉的全方位体验。最为重要的是,大鹏新区通过深度挖掘史实,将两者有机结合,实现文化生态化与生态文化化的叠加效应。

大鹏新区地处古代中国大陆的前沿,明清时期屡与侵略者和海盗交战。在1839年9月至11月发生的中英“九龙海战”中,大鹏人赖恩爵指挥大鹏营水师作为主力部队打响了鸦片战争中反侵略的第一枪,被清廷授予勇士称号,后升任南澳镇总兵、广东水师提督,谥封从一品“振威将军”。由此,为了纪念大鹏半岛的阵亡军士便形成了大鹏清醮这一民间风俗。作为这一民俗的收官活动“将军宴”中包含了以本地菜为主的各种美食。这些美食的原料与制作方法都是基于大鹏半岛本地的自然资源而形成的。比如,在濑粉仔的制作中,产自半岛周边海域、陆域的海胆、冬米、椰壳就是必不可少的原料。在米粉制作中,经过舂米成粉、加水调浆的过程,米粉浆在有圆孔的椰壳中被摇晃、抖动,流到沸水中,煮熟后放上油盐调料,即可食用。大鹏本地人称这种以手摇动椰壳,让米粉浆从孔中流出的动作为“濑”,以这种方法制作的米粉为“濑粉仔”,极具特色。据传,在抗英捷报传来后,赖恩爵的夫人曾亲自下厨制作濑粉仔,慰劳胜利归来的将士。从此濑粉仔名声大噪,与胜利的捷报一起传遍四面八方。与此同时,在富有独立自主色彩的太平清醮中,大鹏民间风俗在军民融合中实现升华,与爱国主义和反侵略的伟大民族精神结合起来,成为大鹏新区滨海生态文化旅游的新亮点。

在绿色科普产品方面,大鹏新区着重强调将生态文明思想纳入素质教育体系,积极补充生态文明教育资源,发展生态文明教育事业,推动新型“自然学校”建设。自然学校是指一种以户外课堂为主,专门帮助城市中小学生亲近大自然,学习自然知识、拓展视野,促进团队合作能力提升的综合素质教育项目。广东地区的自然学校主要由中央企业和地方政府机构合作建设。在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和深圳市生

态环境局共同支持下,深圳市本土央企华侨城集团有限公司于2014年1月创办第一所自然学校——华侨城湿地自然学校,并于2016年扩建至大鹏新区下辖的杨梅坑监测站自然学校。自然学校的绿色科普产品种类丰富、启发性强。比如,在湿地自然学校面向小学生开发的认识外来植物自然教学活动中,设计者就将正向、互动、可持续作为关键词,帮助学生热爱大自然,主动观察自然,学会与自然互动、与身边同学互动,引导学生思考人类行为结果的长期、持续性影响,培养学生对守护自然的责任感。通过“含羞草演一演、豆类数一数、种子抖一抖、螳螂菊清一清(资料编号:ZR20231112)”实践,引导学生思考外来植物以何种方式传播种子、外来植物如何大面积生长等问题,给学生以深刻的自然科学启迪和人生启迪,使生态文明的种子在学生心底扎根,逐渐理解调节人类活动对提升环境可持续性和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重要意义。

####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从分析框架与典型案例两个方面,运用量化与质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中国经验展开了探索性的诠释。经过十余年的持续人力、物力和财力投入,大鹏新区在新时代通过人文经济建设成功走出了一条绿色发展新路。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规律对未来中国人文经济建设具有重要启发性意义,它说明不仅是“文化很发达的地方,经济照样走在前面”,而且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方面也可能具有“先行示范”的价值,需要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角度进一步对本文提出的“五层次四结合”分析框架进行补充拓展和对现实世界的“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实况进行深入挖掘。

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中,有关经济体制

改革的内容占了近一半的篇幅。其中，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重中之重——《决定》中出现了三次的“高水平”这一字眼，对应的市场经济体制、科技创新、对外开放格局贯穿于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全过程，充分体现在大鹏新区围绕“打造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度假区”战略目标推动改革实践的各个方面。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最终被细化为“要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sup>[25]</sup>实质上，激发经营主体活力的基础在于服务供给者和消费者双方在时空维度上的双重解放，根本在于顺应宏观经济规律，广泛释放“节约人力的技术需求”，摆脱早期全球化背景下明清中国农业社会曾经遭遇的“高水平均衡陷阱”<sup>[26](P296)</sup>困境。从而，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强调的“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sup>[27]</sup>重要论述高度上，认识“扩大内需”这一当前战略之举的深远意义，把“投资于人”和“人之消费”视为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构建以新时代人文经济为基础的、和谐稳定的“高水平”国内循环和全国统一大市场。

由此，基于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有了更高维度的历史主题——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跳出古老国度曾经遭遇的“高水平均衡”和“内卷化”的陷阱。这个命题使得现有主流经济学的“传统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知识供给不足的短板暴露得日益明显。本文研究对象属于较为新颖的理论和实践创新域，主要观点具有明显的探索性、尝试性，对于文章所尝试瞄准的经济学理论范式更新问题、人文经济赋能绿色发展的成本收益“错位”问题，还需要来自现实的更多检验。

#### 参考文献：

[1]杜尚泽，潘俊强. 总书记关注的这个题目，有中国的未来[N]. 人民日报，2023-07-10(1).

[2]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做示范谱写“强富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N]. 人民日报，2023-07-08(1).

[3]新华社新时代人文经济学课题组. 新时代人文经济学发展范式研究[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 11-19.

[4]席伟健. 习近平人文经济思想的生成逻辑、理论内涵及践行路径[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5(1): 27-36.

[5]席伟健，李芷仪. 全过程人民民主嵌入乡村生态治理的内在机理分析——基于“势能—动能—效能”的三维框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4(11): 172-180.

[6]席伟健. 克服“非正规性”：一项“先行示范区”走向高质量发展的学理研究[J]. 政治经济学报，2024(2): 25-40.

[7]方世南. 论新质生产力理念蕴含的生态文明思想[J]. 思想理论教育，2025(2): 36-42.

[8]罗卫东. 论中国式现代化的人文经济属性[J]. 浙江社会科学，2025(1): 28-41, 156.

[9]田红娜，丁倩倩，吕希琛. 数字化赋能绿色创新——科技向善与寻租的义利之辩[J]. 软科学，2024(2): 1-8.

[10]桑明旭，徐星美. 论新时代人文经济学的唯物史观基础[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5(1): 126-140.

[11]董慧. 人文经济学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耦合互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J]. 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5(1): 1-9.

[12]魏方莉. 我国EOD模式实施路径研究——基于政策文本分析的视角[J]. 湖北社会科学，2023(12): 87-95.

[13]范如国. 平台技术赋能、公共博弈与复杂适应性治理[J]. 中国社会科学，2021(12): 131-152, 202.

[14]黄先海，宋学印. 赋能型政府——新一代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建构[J]. 管理世界，2021(11): 41-55, 4.

[15]韩先锋，勾亚楠，肖远飞，等. 数字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制度创新的力量：政策协同赋能的视角[J]. 中国工业经济，2024(11): 62-80.

[16]吕越，马明会，陈泳昌，等. 人工智能赋能绿色发展[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3(10): 100-111.

[17]陈松. “模型落地”和“语境转换”——数字技术赋能下的历史研究[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6): 100-112.

[18]秦宗财. 人文经济学视域下的国家文化公园空间建设[J]. 学习与实践，2024(3): 125-130.

[19]左卫民. 法律如何因应科技：审思与前瞻[J]. 中国

法律评论, 2024(6): 1-13.

[20]王春光. 地方性与县域现代化实践——基于对太仓与晋江持续近三十年的调查[J]. 社会学研究, 2023(3): 1-22, 226.

[21]管仲. 管子[M]. 李山, 轩新丽, 译注. 北京: 中华书局, 2019.

[22]陈爱萍. 资本主义起源理论逻辑转换的历史唯物主义向度——“政治马克思主义”超越传统解释模式的理论进路及其效应[J]. 世界哲学, 2024(6): 120-129.

[23]马梦瑶, 唐健雄. 旅游城镇化对山地片区乡村振兴的非线性影响研究——以武陵山片区为例[J]. 地

理科学进展, 2024(5): 950-965.

[24]解佳, 陈淑玲. “折叠”地方: 平替景点生产的媒介逻辑及其影响[J]. 旅游学刊, 2024(8): 40-52.

[25]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在京举行[N]. 人民日报, 2025-10-24 (1).

[26][英]伊懋可. 中国的历史之路: 基于社会和经济的阐释[M]. 王湘云, 李伯重, 张天虹, 等,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3.

[27]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 2025-10-29 (1).

【责任编辑 苏聪文】

## Humanistic Economy Empowering Green Development: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Typical Case

*XI Weijian & SUN Yuhan*

**Abstract:** As a new form of human civilization, Chinese modernization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success, giving rise to a new-era humanistic economics based on the dual prosperity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economy. This paradigm is set to transform and expand traditional theoretical frameworks. In practice, the contemporary Chinese humanistic economy offers a pathway for green development that is distinct from both the “substitution theory” which prioritiz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pastoral theory” which emphasizes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It highly stresses the significance of real-world human interactions and the controllable approach of “combining tradition with modernity” which is conducive to achieving sustainability. To analyze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humanistic economy empowers green development, this paper proposes a “five-level and four-integration” analytical framework, comprising the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 clarification of boundaries, innovation of ecology, expansion of openness, and promotion of values.” It posit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may face a cost-benefit disalignment during the empowerment and development cycles, potentially leading to unsustainable policies. Drawing on the development case of Dapeng New District in Shenzhe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which aims to “build a world-class coastal eco-tourism resort,” a step-by-step empirical examination is conducted. Utilizing non-parametric methods such as Lo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Loess),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GRA), and Generalized Additive Model (GAM), the cumulative, lagged, and nonlinear effects of macro-level empowerment are interpreted. The findings reveal a period of disalignment lasting 5 to 6 years between the investment in humanistic economic constru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green development. Furthermore, qualitative data are used to clarify how, at the micro-level, this case combines the “traditional Lingnan maritime cultural spirit” with the “modern bay area coastal tourism economy” to empower green development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and gradually solves the problem by cultivating eco-tourism. The paper concludes by summarizing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of humanistic economic construction to achieving green development and enhancing sustainability, with the aim of offering a fresh perspectiv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new-era humanistic economics.

**Keywords:** Humanistic Economy; green development; sustainability;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non-parametric methods